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论丛

诗意的叛逆

杨恒达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论丛

诗意的叛逆

杨恒达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意的叛逆/杨恒达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1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论丛)

ISBN 7-5000-6549-3

I. ①诗... II. 杨... III. ①美学—流派—研究—西方国家
②文学流派—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8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1255 号

诗意的叛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cph.com.cn>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福利工厂胶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44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14.00 元

目 录

文艺规律与美学问题探讨

现当代西方人的思想存在与文学	(3)
现当代西方人的价值追求与文学	(24)
从多元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的文学演变	(60)
尼采对美的基本定义	(75)
尼采论“美感是一种错觉”	(90)
关于醉与崇高	(105)
比较文学教材中的学科定义问题	(118)
文艺的社会批判功能	(125)

作家作品评论

“硬汉”也迷惘	(133)
茨威格与《象棋的故事》	(138)
卡夫卡:给你一个独自窥视现代人心灵的窗口	(142)
对庞德诗歌《在一个地铁车站》的感悟	(146)
欧洲中世纪的五部史诗	(150)

翻译研究

翻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173)
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	(182)

文艺规律与美学问题探讨

现当代西方人的思想存在与文学

西方社会自从进入 20 世纪以来,由于物欲的膨胀和物化的加剧,人的生存环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人的生态、性格和心态都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特有的烙印,同时必然反映到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来。

一、现当代西方人的性格和 环境的关系与文学

自文艺复兴始,一直寄希望于理性的西方人由于新的历史境况的触发日趋强烈地感受到,理性越发展,越无法理解人自身,这仿佛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斯芬克斯”之谜。难怪卡西尔在《人论》的开头这样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①看来人的谜确实是够深奥的,所以才被哲学家们视为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主题。即便是在现当代西方社会,高度发展的理性也没能认识人自身,那么人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指望什么呢?世界的荒诞感正是这样产生的。

1. 荒诞的世界与文学

19 世纪,两位德国哲人叔本华和尼采早已经深深感受到世界

① 德 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中文 1 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3 页

的荒诞性。在叔本华看来,世界的绝对本源是盲目的、超出于人的认识范围之外、不受充足理由律支配的意志。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使人痛苦,使人内心不得安宁。这种由非理性支配的世界,当然是荒诞的。尼采则进一步指出,人降生和存在本身是荒诞的。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引用了这样一个希腊神话:“弥达斯国王在树林里久久地寻找酒神的伴护,聪明的西勒诺斯却没有寻到。当他终于落到国王手中时,国王问道: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东西?这精灵木然呆立,一声不吭。直到最后,在国王强逼下,他突然发出刺耳的笑声,说道:‘可怜的浮生呵,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① 尼采引用这个神话的目的是要说明,人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受意志支配的世界上是注定要遭受痛苦的,想要活下去,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以意志的扩张克服和消除意志所带来的痛苦,从而摆脱和超越世界的荒诞。

尼采的意志主义给存在主义很大启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宣告:“上帝已经死了!”这种貌似权威的勇敢的呐喊,感召人们举起反叛的义旗,试图探索一种济世救人的方法。认为“可以用这种方法庄严地面对宇宙,面对世界,这个世界已被剥夺了曾经是它的中心和它的活的目的的东西,失去了被普遍接受的具有综合作用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已被变得混乱无序,毫无意义——荒诞”^②。

由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自我,所以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超越个人主义的思想局限。马克思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

①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86,10—11页。

② [英]艾斯林著,杨恒达等译:《荒诞的意义》,见黄晋凯主编:《荒诞派戏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版,12页。

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¹。马克思的意思很清楚:因为人把类存在看做自己的本质,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如何在改造对象世界中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而个人主义观点则不可能理解人的类存在和群体存在的意义。当对上帝的信仰至高无上时,人为上帝活着;现在上帝死了,整个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人又是为谁活着呢?如果说人为自己活着,那么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死了以后,他活过的一生对自身又有什么意义呢?由此而产生的荒诞感极其强烈,人不仅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荒诞,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存在更感到荒诞。

存在主义作家加缪说,“经过千年沧桑变幻,世界与我们的对立愈加强烈。我们在一瞬间突然不再能理解这个世界”。“世界逃离我们,因为它又变成了它自己”,“好像一个人在某些时间里,突然感到平日很熟悉的一个女人的面孔变得完全陌生”。“世界的这种密闭无隙和陌生……也分泌出非人的因素”。“这种在人本身的非人性面前所产生的不适感,这种在我们所是的东西的图像前引起的堕落,这种被我们时代的某个作家称作‘厌恶’的感情,同样也是荒谬。而我们在几秒钟内看到的镜子里的陌生人,我们在自己拍的相片上看到的熟悉而又令人厌烦的兄弟,同样还是荒谬”²。加缪的这段话深刻地揭露和剖视了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人和对象世界的对立和疏远,人和人的隔膜和陌生,人和自身的对立和异化,已经加剧到无法挣脱和不可理喻的地步,以致整个世界对人来说都是荒诞。

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版,第1卷,46、47页。

² 转引自柳鸣九主编:《20世纪文学中的荒诞》,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1版,270页。

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劳动的必然恶果。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¹。显然,不克服异化,不超越个人本位主义,想消除世界的荒诞感是不可能的。但是,西方新人本主义思潮只空谈克服异化,不论超越个人本位主义,甚至因个人本位主义受到挑战而感到恐惧和危机。面对这样一种困境,存在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哲学思潮席卷了西方世界,萨特的“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的名言,引起了欧美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共鸣。

伴随着哲学上对世界和人生的这种观念,文学作品中也大量产生了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的荒诞性主题,反映了现当代西方人新的性格趋向,揭示了他们在荒诞的社会环境中的生态和心态。

(1)世界的无目的、无意义、无理性

这样的主题告诉我们,世界只是一种无目的的存在,没有意义,没有理性,也没有适应人的需要而产生的目的性。人试图赋予世界某种目的和意义是徒劳的,因为连人自己的存在本身都是无目的、无意义、无理性的。虽然人历来被称作理性的动物,但是人的存在并不因此而变得有理性,人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虚有;人为自己设定的目的,人赋予自己的意义,也完全出自偶然。卡夫卡的作品《城堡》中的主人公要进入城堡,这是他为自己设定的目的,但是为什么要进入城堡,进入城堡与他作为土地测量员的身份究竟有何关系,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一切都莫名其妙。他莫名其妙地来了,莫名其妙地要进入城堡,又莫名其妙地怎么也进不去。他周围的整个世界同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似乎毫无关系,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化的世界上,他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中文1版,第42卷,96页

(2)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法沟通

这样的文学主题告诉我们,尽管现代科技把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拉近了,可是却把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拉大了。美国作家阿尔比的荒诞剧《动物园的故事》的思想内容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剧中的地点是在纽约市中央公园,三十多岁的主人公杰利来到这里,试图同坐在长凳上的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彼得交谈。为此他还主动介绍了自己无法同周围人交流和沟通的历史:已故的双亲因生前的堕落而不能引起他的怀念;和抚养他的亲戚之间毫无感情;他的女友也没有一个值得他留恋;他寄宿的公寓也是一个情感交流的死角,淫邪的房东太太嘴里发出恶臭,隔壁住着专搞同性恋的黑人房客,一个不知姓名的女人终日紧闭房门,不停地啼哭,这是他十分鄙夷和厌恶的家伙。杰利试图以真诚来换取同彼得的交流,然而不但没有达到目的,最后还将自己的胸脯扑到他逼彼得拿起他扔给他的尖刀上自杀身亡。当他听到彼得连声哀叫“我的上帝”时,才感到自己终于和别人实现了交流而心满意足地死去了。呜呼悲哉!剧中的杰利向彼得所谈到的参观动物园的感想直接点明了主题:动物与动物之间是用栅栏隔开的,人与动物之间是用栅栏隔开的,人与人之间也是用栅栏隔开的,彼此之间无法沟通。

(3) 无处不在的父亲形象

这样的文学主题告诉我们,父亲作为一种权威的象征,泛在地主宰着整个现当代西方社会。他有时直接出现,如在卡夫卡的《判决》中,那位父亲的威严和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判决儿子去死,儿子必须绝对服从。他有时以皇帝的面孔出现,如在卡夫卡的《中国长城的修建》中,人们只知道皇帝下令修建长城,可是连皇帝是谁都不知道,而且长城都是一段一段地砌成的,毫无防御敌人的功用,敌人随时可以从两段长城的间隔中冲过来,人们明明知道这一点,

却还是在皇帝权威的支配下去修建毫无用处的长城。他有时又以法庭的形式出现,如在卡夫卡的《审判》中,主人公虽然在被宣布逮捕以后到处寻找法庭,以便为自己申辩,却到处也找不到它,当他好不容易找到设在贫民区楼房顶楼上的法庭办事处后,又慑于法庭的权威,以致怵然失魄地在自觉有罪的泥坑里越陷越深。总之,作为权威象征的无处不在的父亲形象还往往以其他种种形式出现,这反映了现当代西方人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既向往自由,又恐惧自由,既想摆脱权威,又屈从于权威的精神困境。

2. 现当代西方人的性格特征与文学

现当代西方人的性格特征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概括为:悖论,内向,冷漠,等待。

现当代西方人由于对理性的信念的动摇,总是生活在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中,这被西方哲学称为“paradox(悖论)”。美国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最能恰当、生动地说明这个问题。这部作品描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地中海一个小岛上的美国空军中队里的故事。空军投弹手尤索林看到了种种丑恶现象,但是不敢反抗,只想保全自己,被人嘲弄为胆小鬼和疯子。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疯子可以不执行飞行任务。但是军医告诉他,想要停止执行任务必须写书面报告,向上级提出申请。可第二十二条军规又规定,如果一个人能明确提出申请,说明他神经正常,不得拒飞。第二十二条军规还规定,飞行员执行飞行任务满32次以后可以回国。但是他必须在停止执行任务之前服从上级命令。尤索林在飞满军规所规定的飞行次数以后,上级又把规定的任务增加到四五十次,甚至六七十次。最后尤索林开了小差,逃到瑞典。”他终于明白,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一种专门捉弄人的法则,它仿佛是一张感觉到,却看不见、逃不脱、躲不掉的隐秘的恢恢大网。第二十二条军规说明了现当代西方人的生存状态,他们受着这种悖论式的法

则的摆布和支配,给他们的性格也打上了悖论的烙印。他们似乎有各种各样的追求,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异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性格上无不受到《尤利西斯》所告诉人们的现代社会的庸人主义、虚无主义、肉欲主义的驱动和侵染。

正因为现实社会中,现当代西方人所遇到的是一张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那样的无法摆脱的大网,所以他们也只能像尤索林那样开小差,遁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这同现当代西方哲学和文学上的“向内转”的趋势是一致的。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地洞》形象地说明了现当代西方人这种内向的性格特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动物,它造了一个又大又坚固的地洞,并加以伪装,但仍然处于莫名其妙的恐惧之中,生怕受到外敌的侵袭。人们有时说:“恨不得有个地洞让我钻进去。”卡夫卡笔下的这只动物有地洞可钻,而为人来讲,这个可钻的地洞便是他的内心世界。

现当代西方人逃向内心世界,使自己陷入更深的困惑和迷惘。由于人们受到现实世界的异己力量的威压,很想到内心世界去看看自己,结果却发现自己并不认识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文学中出现的“迷惘的一代”,正是在这种内外困境的逼迫下产生的。大战爆发的时候,一些热血青年在帝国主义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影响下,抱着美好的幻想和爱国主义激情走上了战场。在火与血的搏斗中,他们亲眼目睹了残酷的战争给参战的各方所带来的惨不忍睹的灾难,受害最深的当然是普通的士兵和老百姓。战争结束后,那些在战争中出生入死,有的甚至成了残疾的青年人又面对着动荡不安的资本主义现实,生活无着。他们搞不懂为什么有人要发动战争,为什么自己要参加战争,他们对世界,对自己,都感到无法理解,失望之极,成了迷惘的一代。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是典型的“迷惘的一代”的作品。前一部作品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流落在巴黎的一群英美青年,他们玩世不恭,寻

欢作乐、跳舞、喝酒，生活放荡，以此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后一部作品写美国青年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志愿兵参加了意大利军队的战地汽车救护队，爱上了英国护士凯瑟琳小姐。他们讨厌战争，双双逃到了瑞士，尽管逃出了战争的魔掌，可还是没有逃脱死神的捉弄，凯瑟琳在难产中死去，亨利心灰意冷，精神完全崩溃，他感到人好比蚂蚁一样，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这两部小说发表以后在西方引起轰动，正说明它们所表现的时代倾向在西方得到了强烈共鸣。

迷惘是西方人对荒诞世界的心理反应，但作为性格特征显示出来的则是冷漠，对一切都感到无所谓。这在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中得到了绝妙的描述。主人公莫尔索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莫名其妙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感到无所谓：母亲死了，他无所谓；情人爱不爱他，他无所谓；公司给他优厚的待遇，让他去巴黎，他无所谓；甚至他杀了人，被判处死刑，他也无所谓。在他看来，既然人是要死的，那么怎样死和什么时候死都无关紧要。莫尔索的冷漠令人感到酸楚和悲哀。这种冷漠正是现当代西方人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感到无可奈何，感到绝望的心理病态：既然一切都是那样荒诞，那样不合理性，何苦去做徒劳的事情呢？只好开一些黑色幽默的玩笑来缓解内心的痛苦。

黑色幽默作家们所表现的冷漠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最残酷、最令人惨不忍睹的现实景象，也会成为他们开玩笑的资料。例如，黑色幽默作家托马斯·品钦的短篇小说《伊色弄到了一个鼻子的差事》是这样来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士兵的：“他们蹒跚的跛行可能意味着在一只腿上布满了由伤疤的结缔组织构成的锦缎和浮雕。有多少女人曾经看见了这些而又躲开了？他们很想把咽喉上的疤痕像华丽而俗气的战争勋章一样谦虚地隐藏起来：他们的舌头从面颊上的一个洞口伸了出来，由于这张额外的嘴

巴,他们将永远不能再讲什么悄悄话。”^①

等待成为现当代西方人的一个重要性格特征。既然在荒诞的世界上做任何努力都是白费,连开黑色幽默的玩笑也是多余,剩下的事情自然是只有等待。古代的英雄是奋争进取的。不妨设想,远比当今的人更相信神谕力量的古人,如俄狄浦斯,如果他屈从于命运,坐在家里静静等待弑父娶母的厄运降临,那么千古流传的俄狄浦斯悲剧便不会发生。他偏偏不愿等待,这是英雄的性格所致。可是昔日的英雄不能再世,当今是一个庸人的时代。《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很能代表当代西方人的庸人倾向。他任其老婆与他人通奸,却躲在外面四处游荡。这种庸人主义达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

等待本来是在一时达不到目的或情况不明的境遇中人们采取的一种行为方式。但是像《等待戈多》中两个流浪汉那样莫名其妙的等待,真是不可思议。人们曾对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延宕或等待不能理解。但是,哈姆雷特的等待并非莫名其妙。他身处布满敌对势力的宫廷,随时受人监视,连儿时的同学也成为仇人的帮凶,他最应该信赖的女友竟扮演了刺探他的情报的间谍。总之,对于哈姆雷特来说,宫廷是一个充满异己力量的敌对世界。哈姆雷特的等待同他陷入“生存还是毁灭”的忧郁和沉思相关。这个问题涉及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尽管现当代西方人的科学理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却不能为这个问题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因而人们对这个问题格外关心,尤其感到痛苦和失落。所以,作为现当代西方人整体状况的写照的《等待戈多》中的那两个流浪汉,尽管他们的等待从表现上看比哈姆雷特更不可理喻,但是却深刻地反映了处于物

^① 转引自廖星桥主编:《西方现代派文学 500 题》,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 版,545 页。

化和异化状态下的无奈和妄想。他们等待的戈多与其说是一个名字或符号,倒不如说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即虚无。尽管他们的等待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他们还要等待下去,等待已经从一种行为方式沉淀和转换为一种性格特征而被模铸和固定下来。

现当代西方人的性格特征附丽着浓重的悲观主义的色彩。好在西方人富有悲剧精神的传统,西方思想史上,即便是那些最激进的反传统观点的人,如尼采,对悲剧精神总是肯定和赞赏的。所谓悲剧精神,可以理解为面对灾难、不幸、痛苦和死亡的必然性,勇敢抗争,奋斗不息,向命运之神宣战。鼓吹超人哲学的尼采曾狂呼:“笑一切悲剧!”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借用古希腊西绪福斯的神话来表现人不为苦役所压服的顽强的生存意志。西绪福斯推巨石上山,还没到山顶,又滑滚下来,于是又从头做起,承受着无休止的折磨和劳损,但被磨砺得更加坚强。正是这种西绪福斯式的悲剧精神,激励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悲剧精神的弘扬,有助于克服悲观主义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海明威从“迷惘的一代”的作家成为一个竭力塑造“硬汉子”形象的文学大师,也正是由于这种悲剧精神。《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为了把在深海捕到的大马林鱼拖回岸上,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英勇无畏地同凶猛的鲨鱼搏斗。当他精疲力竭地把大马林鱼拖回到岸边的时候,只剩下这条鱼的一付空骨架。桑提亚哥同鲨鱼的搏斗是徒劳的,但他还是不屈不挠地搏斗。

现当代西方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尤其是存在主义,不厌其烦地宣扬“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既体现了现当代西方人的精神意向,又反过来影响了现当代西方人性格特征的形成。存在主义所提倡的“自由选择”和“介入哲学”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按照弗罗姆的看法,性格是一种既使人顺应社会,又使人选择社会的心理动力机制。萨特反对任何决定论,认为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作

出自由选择,这实际上是要求人面对“世界荒谬,人生痛苦”的困境,用悲剧精神来抗争,消除物化和异化状态给人精神上所造成的压抑和禁锢。看来,尽管受资产阶级立场局限的西方新人本主义思潮无法超越个人主义观点,但是借助于悲剧精神毕竟能冲淡和削弱个人主义受到挑战而造成的悲观主义的消极影响。

二、现当代西方人的心态与文学

现当代西方人的心态突出地表现为恐惧与焦虑。萨特指出:“一种处境引起恐惧,是因为它很可能从外面改变我的生命存在;我的存在引起焦虑是因为在这处境中,我对自己和对自己行为的不信任。”^①有必要从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外两方面来剖视现当代西方人为何恐惧和焦虑,怎样恐惧和焦虑,以及以恐惧和焦虑为特征的人的心态与文学的关系。

1. 对权威的屈从与文学

弗罗姆在对“权威”一词加以辨析时说:“权威并不是某个人所‘具有’的性质……而是指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②这种关系基于己方对他方的优越性和支配欲。恰如卡夫卡所经历和承受的那种不正常的父子关系,儿童时代的卡夫卡总感到父亲的威严和压抑,甚至游泳时,也都会因为自己的瘦小和父亲高大强壮的身体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感到自惭形秽。卡夫卡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对父亲权威的屈从和反叛。卡夫卡的作品里的父亲形象

① [英]莱士列·斯蒂文森编著,李燕、赵建杰译:《人学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中文1版,262页。

② [美]弗罗姆著,许合平、朱士群译:《对自由的恐惧》(又译《逃避自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版,114页。